文章编号:1005-9679(2017)03-0063-07

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吴依桐，　罗守贵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摘　要：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历史性转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基于 2010 年第 6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详细数据，以无政策情景作为参照，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的人口总数、劳动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等进行了预测和分析。结果发现，单一的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劳动人口供给不足、老龄化渐趋严重、居民生育意愿降低等问题，应该考虑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弥补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总体来看，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与质量，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以及适时调整生育政策等途径可以成为有效改善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总和生育率；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

中图分类号：C 923　　**文献标志码：**A

Inferring of The Release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n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hina

WU Yitong，　*LUO Shougu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3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gone through a historical change. Undeniably China's population is now aging. Based on the data released in 2010 National Censuses, we forecasted and analyzed the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ging problem can hardly resolved by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neither is the lack of labor force supply. Thus we believe that further methods should be taken on multiple fronts, thus as enhance the public services, optimize the sanatoria industry, and other procreating promoting policies.

Key word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total fertility rate; population structure; labor force

1　引言

从马尔萨斯提出人口陷阱理论之后，关于是否控制人口数量的问题便争论不休。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人口既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这在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表现得更为清晰。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人口大国，而在经济落后的社会中人口问题便成为了重要矛盾。因此，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我国把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迄今已有四十多年。通过行

收稿日期：2017-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编号：12&ZD026）；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创新型智库成果（编号：20140621）；上海市软科学基金课题成果（编号：16692180100）

作者简介：吴依桐（1992-），上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E-mail：pdcorleone@mail.sjtu.edu.cn。罗守贵，河南固始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软科学研究基地—知识竞争力与区域发展中心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E-mail：sgluo@sjtu.edu.cn。

政手段限制生育，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然而，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1]的结果表明，截至 2010 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 1.18，远低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2.1[2]。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即将面对高度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不足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 年我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高达 10.5%，已经远高于 7%的人口老龄化的红线。而根据蔡昉等[3]的研究，伴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同时，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也势必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4-5]。因此，基于社会现状和政策内容对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总数的方针不变，同时为了缓解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2013 年 11 月，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同时拟定了 2015 年之后全面放开二孩的相关政策。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 2015 年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05，反映出“单独二孩”政策并无显著成效。为有效解决人口结构问题，2015 年 10 月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即“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这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告别了历史舞台。然而，“全面二孩”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生育率严重下滑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呢？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目前，关于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可能的作用效果，国内已经有部分学者尝试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国民经济方面，谢慧蓉[6]通过研究我国老龄人口比例及男女比例走势，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调节现存人口性别问题，同时还能够稳定房价，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焦俊英等[7]讨论了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他们认为面对政策放开后可能出现的新生婴儿潮，个人房屋税、遗产税、个人所得税都需要不同方面的变革，但宏观而论二孩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增加我国税收。在资源分配方面，邓爽等[8]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有调节人口结构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前期政策的落实推广、后期社会面临爆发式的婴幼儿资源需求等问题也会相应产生。在人口及生育意愿方面，张晓青等[9]分别调查了符合单独二孩资格的家庭和现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家庭对生育二孩的看法，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育龄妇女因育儿成本高而放弃二孩生育，因此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来看，应鼓励育龄妇女生育；风笑天等[10]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对幼儿园、小学以及初中学生的父母进行二孩意愿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各省市申请二孩生育的比例落差巨大，比如最低的上海市仅有 4.3%，最高的广东四会市则高达 59.3%。从英文文献来看，对我国全面二孩政策进行研究的还相对稀少[11]，现有的对中国生育政策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探讨原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长远影响，如 Ebenstein[12]、Li 等[13]以及 Feng 等[14]。

以上诸多研究说明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很可能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同时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也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预测政策出台后育龄妇女对二孩的生育意愿，其次是讨论政策对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及维持人口红利可能产生的正面效果。然而，生育政策具有惯性强、周期长、落地慢的特点，并且由于涉及人们的主观意愿，其实际效果较难预测。因此，综合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生育率水平进行更为细致的人口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结构和社会负担，既是对已有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深化，也能为政策的实施和改进提供一些指导建议。因此，本文后续将在综合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进一步探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结构的影响。

2　研究背景

从人口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全球多数发达国家都在承受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日本是目前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1990-2010 年间，日本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从 17%提高到 36%，养老负担居全球之首。相比之下，欧洲两个大国——德国与法国的社会养老负担略小一些。这两个国家 1990 年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均高于日本，但由于较低的增速，至 2010 年，两国的老年抚养比均低于日本，分别为 27%和 29%。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 1990 年时其老年抚养比与日本、德国和法国相近，但由于大量的移民迁入等原因，老龄化程度上升的速度小于这 3 个国家，2015 年其老年抚养比也只有 22%。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事实上我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限制生育的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控制人口，新加坡也施行过类似的生育限制政策，主要包括对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采取了诸如减少产假和政府津贴等政策，旨在将总和生育率控制在 2～3之间。从图 1 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效果在前期非常显著。然而在 80 年代后期，新加坡政府发现随着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改变，出生率不断下降，导致人口出现了老龄化现象，因此开始调整相关政策鼓励人们生育，尤其是对生育多孩的家庭实施大幅度的现金奖励。但是，由图 1 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仅在 1988 年前后受到了短暂的上升冲击，其后便继续表现出长期的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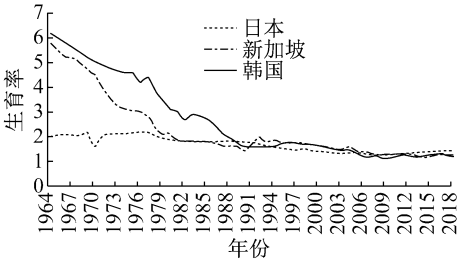

图 1　亚洲三国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

由此可见，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不断进步，人们对家庭、对人生追求的观念也都在悄然改变。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已经表明，如今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与 30 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在未来一个世纪将产生的人口问题很可能是超乎想象的。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对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反思和剖析，并对未来的人口结构进行科学的预测。

3　模型与数据

对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已经有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关数理模型和实证模型，如宋佩锋[15]、秦中春[16]等。本文采用区域人口场景预测[17]的统计学方法进行人口预测，该预测的基本技术又被称为人口年龄移算。在某一区域人口总体中，个体自出生之日起每过一年便增长一岁，这样某一时点、某一年龄段的人口在发展到下一年对应时点的基础上便增加一岁，并以此类推，每增加一年便进入更高一层的年龄组。其基本思路就是根据某一时点各年龄组人口数，按照一定的人口存活比例去推算未来某年相同时点的对应年龄组的人口数，并以此建立人口计算模型继续推算下一年的人口数：

$$\text{总人口}_n = \sum_{m=0}^{100} \text{总人口}_{n-1}^{m} \times (1 - \text{死亡率}^m) + \text{出生人口}_n \tag{1}$$

$$\text{劳动人口}_n = \sum_{m=14}^{63} \text{总人口}_{n-1}^{m} \times (1 - \text{死亡率}^m) \tag{2}$$

式中：m 为岁数；n 为年份。

假设第 n 年 k 岁女性人数如下：

$$F_n^k,\ k = 0,1,\cdots,100 \tag{3}$$

则第 $n+1$ 年的新生女婴数量为

$$F_{n+1}^0 = \left(\sum_{k=16}^{49} F_n^k \cdot \beta^k \cdot \gamma\right)(1-R) \tag{4}$$

式中：R 为新生婴儿死亡率；β^k 为 k 岁妇女生育率；γ 为新生婴儿中女婴的占比。则第 $n+1$ 年的女性数量可表示为：

$$F_{n+1}^t = F_n^{t-1} \cdot (1 - R^{t-1}) \tag{5}$$

$$t = 1,2,\cdots,100$$

式中：R^t 为 t 岁女性死亡率。

结合以上式(1)～(5)进行递推，则可得到每一年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

用于反映人口结构特征的指标有很多，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主要观察总人口、劳动人口、劳动人口占比、老年系数(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少儿系数(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以及抚养比(0～14 岁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除以劳动人口)这 3 个指标。其中，社会总抚养比又被称为负担系数，指的是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用于衡量每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抚养负担。

本文使用的数据“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情况”“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状况”以及“全国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等数据均来自《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年鉴》，同时辅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作为补充。

4　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

首先，引入总和生育率(TFR)的概念。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与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将特定时点上全体妇女的生育率综合起来，以一个数字来表示。实际上，相当于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各年龄段生育率进行生育。根据《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 年全国妇女一胎生育率 0.728，二胎生育率为 0.381，三胎及以上生育率为 0.079，总和生育率约为 1.18，即在 2010 年这个时点上，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

1.18 个孩子。以两种情况进行比较：① 无二孩政策，假设所有妇女按照 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生育；② 自 2015 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起，所有有意愿生育一胎的妇女均选择生育二孩，即二孩生育率升为 0.728，与一胎生育率加总后，得总和生育率 1.46。容易看出，第 1 种假设情景是对人们生育意愿持极悲观态度，第 2 种假设情景则是对人们生育意愿持极乐观态度。

4.1　总人口与劳动人口

根据前述的模型和条件假设，我们对无政策情景和全面二孩情景两种情况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推算到了 2090 年（见表 1）。

表 1　无政策情景下 2010 年至 2090 年人口变化

年份	总人口/人	劳动人口/人	劳动人口占比/%	年份	总人口/人	劳动人口/人	劳动人口占比/%
2010	1 332 810 869	992 561 090	74.5	2029	1 344 265 906	936 425 515	69.7
2011	1 338 055 182	996 310 538	74.5	2030	1 338 483 724	925 003 713	69.1
2012	1 343 152 292	998 606 805	74.3	⋮	⋮	⋮	⋮
2013	1 348 004 569	1 000 649 428	74.2	2040	1 251 410 045	794 554 720	63.5
2014	1 352 554 141	999 586 786	73.9	⋮	⋮	⋮	⋮
2015	1 356 695 591	998 537 687	73.6	2050	1 116 150 871	680 264 026	60.9
2016	1 360 336 550	997 254 286	73.3	2051	1 100 525 608	665 756 009	60.5
2017	1 363 407 994	993 114 112	72.8	2052	1 084 627 727	648 547 074	59.8
2018	1 365 832 854	988 869 717	72.4	⋮	⋮	⋮	⋮
2019	1 367 578 611	984 530 625	72.0	2057	1 002 301 308	568 359 126	56.7
2020	1 368 550 333	980 310 456	71.6	2058	985 605 635	555 243 733	56.3
2021	1 368 726 703	977 336 699	71.4	2059	968 923 691	543 781 183	56.1
2022	1 368 147 749	973 061 985	71.1	2060	952 286 944	532 897 766	56.0
2023	1 366 794 209	970 770 543	71.0	⋮	⋮	⋮	⋮
2024	1 364 685 202	971 939 751	71.2	2070	790 655 537	447 018 597	56.5
2025	1 361 861 680	970 010 953	71.2	⋮	⋮	⋮	⋮
2026	1 358 367 358	969 682 903	71.4	2080	643 083 204	357 134 807	55.5
2027	1 354 246 390	961 517 387	71.0	⋮	⋮	⋮	⋮
2028	1 349 526 500	947 293 572	70.2	2090	521 906 638	286 349 659	54.9

注：由于数据过多，我们省略了部分年份。

从表 1 可见，2010 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33亿人，其中劳动人口 9.93 亿人，劳动人口占比为 74.5%。在无政策情景下，即维持现有生育率不变，2029 年劳动人口占比将跌至 70%以下（69.66%），2052 年劳动人口占比将减少至 60%以下（59.79%）。到 2090 年，全国人口总数仅有 5.22 亿人，甚至不到 2010 年的一半，其中劳动人口为 2.8 亿人，占比只有 54%。

从表 2 可以看出，即使有生育意愿的家庭都选择生 2 个孩子，也不能改变 2010～2050 年人口变化的根本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① 从 2015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出生的婴儿最早在 2030 年后才会计入劳动人口；② 上层年龄的人口基数太大，第一代生二孩的影响微乎其微，而 2015 年放开二孩政策后出生的女婴，至少在 2030 年后才有可能生育。

综合表 1 和表 2 可知，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能改善未来 15 年之内的劳动人口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没有二孩政策，我国总人口将在 2058 年以后跌破 10 亿人，并在 40 年之内以平均每年下跌 1.96% 的速度锐减，劳动人口占比在 2051 年跌破 60%，并将在未来 40 年内持续下跌至 55%；在有全面二孩政策的情形下，可将我国总人口跌破 10 亿人的时点延后 20 年到来，并在 2078 年之后将总人口平均每年下跌的比率稳定在 1.19%，直至本世纪末，劳动人口占比将在 58%～60%波动。

4.2　年龄结构与抚养比

2010 年，中国人口中 0～14 岁人口占 16.61%，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3%，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9%，社会总抚养比为 22.2%，这意味着每一位

表 2　全面放开二孩后 2010 年至 2090 年人口变化

年份	总人口/人	劳动人口/人	劳动人口占比/%	年份	总人口/人	劳动人口/人	劳动人口占比/%
2010	1 332 810 869	992 561 090	74.5	2029	1 408 958 738	950 954 934	67.5
2011	1 341 671 916	996 310 538	74.3	2030	1 405 768 497	943 251 790	67.1
2012	1 350 403 550	998 606 805	73.9	⋮	⋮	⋮	⋮
2013	1 358 921 623	1 000 649 428	73.6	2040	1 348 692 993	847 760 113	62.9
2014	1 367 176 302	999 586 786	73.1	2041	1 340 934 390	839 143 852	62.6
2015	1 375 054 840	998 537 687	72.6	⋮	⋮	⋮	⋮
2016	1 382 452 925	997 254 286	72.1	2050	1 253 152 607	760 254 036	60.7
2017	1 389 283 763	993 114 112	71.5	2051	1 241 385 214	748 728 235	60.3
2018	1 395 446 681	988 869 717	70.9	2052	1 229 269 047	734 653 994	59.8
2019	1 400 900 535	984 530 625	70.3	⋮	⋮	⋮	⋮
2020	1 405 507 197	980 310 456	69.7	2057	1 164 683 635	672 247 452	57.7
2021	1 409 223 330	977 336 699	69.4	⋮	⋮	⋮	⋮
2022	1 412 087 859	973 061 985	68.9	2060	1 124 667 696	648 550 487	57.7
2023	1 414 057 395	970 770 543	68.7	⋮	⋮	⋮	⋮
2024	1 415 140 381	971 939 751	68.7	2070	996 444 383	599 777 953	60.2
2025	1 415 386 615	970 010 953	68.5	⋮	⋮	⋮	⋮
2026	1 414 839 313	973 265 850	68.8	2080	880 892 862	524 696 566	59.6
2027	1 413 554 746	968 713 333	68.5	⋮	⋮	⋮	⋮
2028	1 411 569 871	958 136 302	67.9	2090	782 134 869	455 840 179	58.3

15～64 岁之间的劳动人口需要负担 0.22 个儿童或老人。根据国际上 60 岁以上人口超过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超过 7%的红线，我国在 2010 年就已经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的阶段。

观察图 2 可以看出，在没有政策冲击的情形下，2010～2050 年，老龄人口占比将急剧增长，60 岁及以上人口在 2052 年超越 40%(41.14%)，并从 2055 年开始增速有所放缓，约 20 年增加 1%，至 2090 年基本稳定在 44%～45%。与此同时，0～14 岁的低龄人口一路下跌，至 2039 年跌至 10%以下(9.9%)，2054 年跌至 9%以下(8.98%)，并在 2054 至 2090 年保持在 8.3%左右。社会总抚养比将在 2021 年升至 40%，在 2054 年超过 70%，并从 2060 年开始增速放缓，直至 2090 年，社会总抚养比基本稳定在 82%左右，这意味着每一位劳动人口要负担 0.82 位儿童或老年人，相当于 2010 年时的3.73倍，并且这 0.82 中有 0.67 位是老人，仅有 0.15 位是儿童。这表明，如果从 2010 年开始不采取任何鼓励生育的措施，到本世纪末，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极其严重，整个社会将面临着越来越重的抚养负担。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由于新生婴儿和老年人的双重增长压力，社会总抚养比超越 40%的时间点将比原来提前 3 年到来(2018 年)。由于育龄妇女比例的减少，0～14 岁人口的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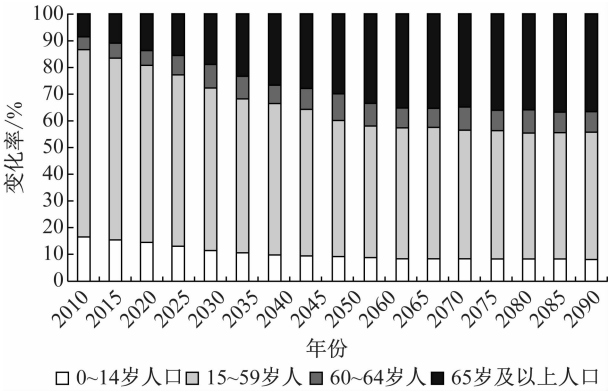

图 2　无政策情景下人口结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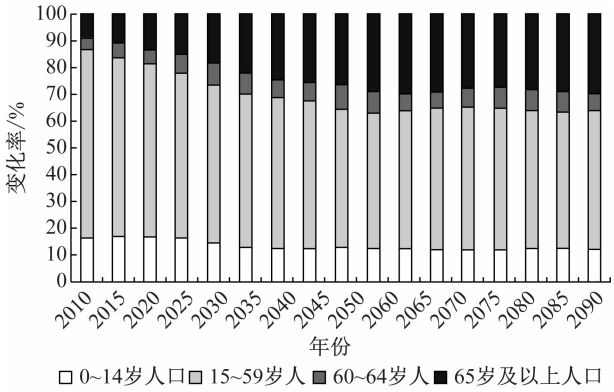

图 3　全面二孩政策情景下的人口结构变化

例将开始下降，并在 2040 年左右开始稳定在 12%左右，这个数字将持续维持至本世纪末。在 2020 年之后的 10 年，社会总抚养比仍将不可避免地渐渐增长至 50%，但在 2060 年之后，社会总抚养比将基本停止增长，并在未来 40 年间保持在 70%左右。这表明届时平均每一位劳动人口将负担约 0.72 位老人或儿童，这其中有 0.51 位是老人，而仅有 0.21 位是儿童。可以看出，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将在本世纪末为每位劳动人口减轻 12%的负担。

人口金字塔结构如图 4 所示，由图可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修正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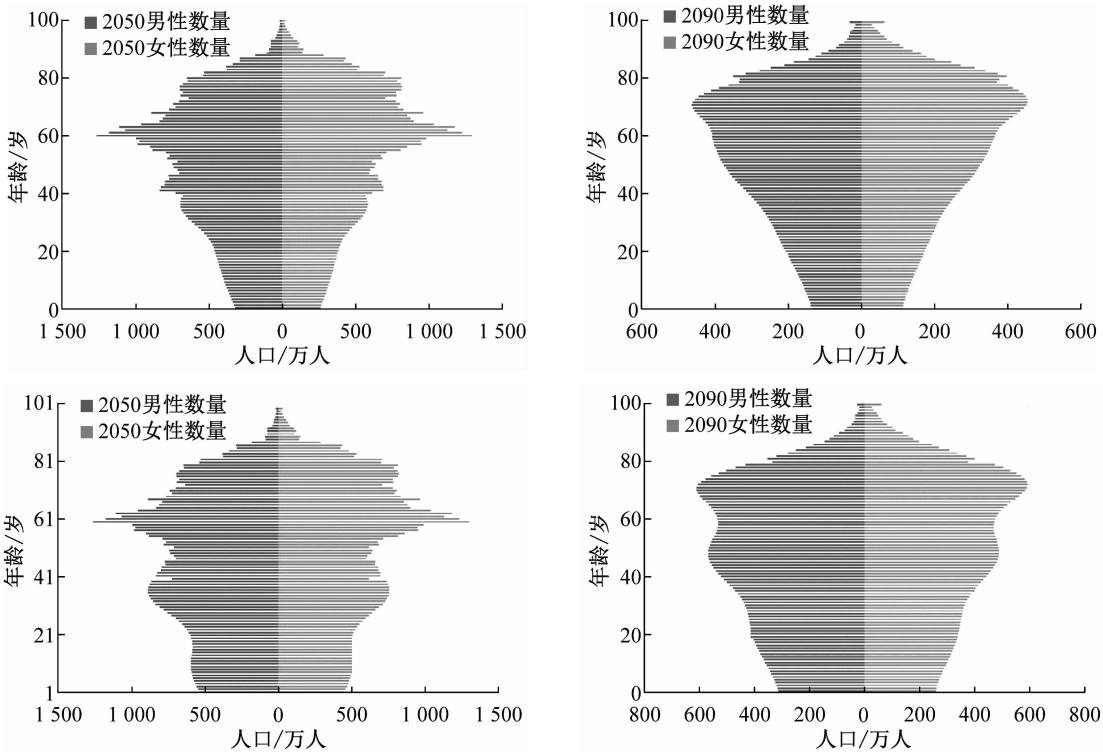

图 4　无政策(上)和全面二孩(下)两种情景下 2050 年及 2090 年的人口金字塔

5　结论、建议与展望

2015 年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的婴儿，最早到 2030 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市场，而 2036 年恰恰是 1976 年前后出生人口的退休时间，那时计划生育刚开始，出生人口还很多。这意味着 2036 年前后将会出现非常多的退休人口，而全面二孩政策后多出生的人口完全不能补偿退出劳动市场的人口数量，即劳动力供给难以改善。同时，根据我们对人口结构、人口总数的变化趋势的测算，发现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会逐渐降低，这一方面与社会观念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另一方面既有的生育率难以受到太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将会逐步加大，这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之下是社会难以承受的。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认为，单一的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劳动人口供给不足、老龄化渐趋严重、居民生育意愿快速降低等问题。为此，应考虑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弥补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

(1) 大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减轻年轻人生育恐惧。生育意愿的降低不仅与年轻人的生活观念改变有关，也与现实中抚养子女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有关。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其他相关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以减轻年轻人对生育多个子女负担加重的焦虑与恐惧。诸如将义务教育扩大到学前和高中，为婴幼儿提供基本的免费公共医疗等都是属于可以探讨的未来与生育政策配套的政策范围。

(2) 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一方面，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甚至可能会束缚年轻人的拼搏创造能力；另一方面，老龄化既是对整个社会提出的挑战，也是为商业活动带来的机会，因为未来的老年人赡养可能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而这一过程中还会得益于相关产业发展的范围经济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因此，逐步推进养老产业，既是缓解社会负担的重要举措，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

(3) 适时调整生育政策。韩国、新加坡等国家

的历史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在进步，结果将导致社会的生育水平处于下降通道，而这是单一的全面二孩政策所难以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五年左右以后，即到 2020 年前后，有必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更进一步，再过十年左右即到 2025 年前后，可能要根据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逐步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随着科技的进步、公共设施的健全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各年龄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都会有小幅度的下跌，人们的平均寿命也会增长。本文研究结果基于 2010 年普查的各年龄死亡率，这可能会导致在短期结果上偏向乐观（实际老龄化现象可能会更严重），在长期结果上偏向悲观（婴幼儿和年轻人的存活率会上升）。同时，本文研究中的“新生婴儿男女比例”也基于 2010 年的普查数据 1.18∶1，并假设在本世纪维持这个数字不变。然而事实上，由于生育理念的改变、二孩政策的放开和相关法律法规变化等原因，剔除人为因素，未来的新生婴儿男女比例应有所改善。

因此，全面二孩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在将来有更丰富的数据的情况下，对我国的人口结构发展趋势进行更加细致、全面的预测，并结合社会资源的承载能力研究其与人口的互动性，仍然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这也是笔者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J].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1(8)：511-512.

[2] Woofter T J. Replacement rates in the productive Ages[J].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37，15(4)：348-354.

[3]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5(4)：4-13.

[4] 张敏，陈秋莲，蒋佳芳.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2015(6)：180-184.

[5] 刘静. 基于人口学理论的中国放开生育二胎政策研究[J]. 经营管理者，2011(15)：68-70.

[6] 谢慧蓉. 浅析全面二胎原因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 新经济，2016(3)：78.

[7] 焦俊英，孔刘柳，鞠卉圆. 思考“全面二孩”对税收政策的影响[J]. 改革与开放，2016(4)：62-63.

[8] 邓爽，刘杰，贺雪娇. 我国实施“全面二胎”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4)：7-8.

[9] 张晓青，黄彩虹，张强，陈双双，范其鹏.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J]. 人口研究，2016(1)：87-97.

[10] 风笑天，李芬. 生不生二孩？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抉择及影响因素[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1)：94-101.

[11] Wang L，Xu X，Baker P，et al. Pattern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caesarean delivery intention among expectant mothers in China：Implications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ew national two-child polic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6，13(7)：686.

[12] Ebenstein A. 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one child policy[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10，45(1)：87-115.

[13] Li H，Yi J，Zhang J.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in China：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J]. Demography，2011，48(4)：1535-1557.

[14] Feng W，Cai Y，Gu B. Population'policy，and politics：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3，38(s1)：115-129.

[15] 宋佩锋. 人口预测方法比较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3.

[16] 秦中春. 中国未来人口变化的三大转折点预测——基于年龄移算人口预测模型的分析[J]. 区域经济评论，2013(5)：5-14.

[17]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2014(2)：3-17.